

蒋文野 著

《马氏文通》

论 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王鸿雁

封面设计:立 群

《马氏文通》论集

蒋文野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江苏镇江印刷厂印刷

855×1168 毫米 1/32 6.25 印张 145,0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定价:9.50 元

ISBN 7-5434-2516-5/H·25



《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先生

(方豪先

唐子之亂由會子拉氏惑於扶清滅洋之說東南
督撫宣布自保不奉朝命兩廣李伯相特奉
諭主持一切逆賊岳勇廷志至行轅勅理公府八月中
旬俄廷突來長電七十餘字竟謂不承諾即封鎖吳淞連
夜議成傳甚以激熱症大作四晨即去世今中國歷史研究
社輯錄存身遺文以入中國內札外編歷史叢書全近保德

李懷柱百歲園述其為國致此原因以告讀者 大里馬建忠



序

传统的汉语学科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三门，汉语之有语法，则自马建忠著之《马氏文通》始。《马氏文通》第一次建立了汉语语法系统，博大精深，是划时代的著作，是“古今来特创之书”。《马氏文通》和它的著者马建忠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近年来研究马建忠、研究《马氏文通》的学者不少，发表的论著也很多，而蒋文野同志对马建忠和《马氏文通》的研究，成绩卓著，可以说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位。

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朱注：“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以往的学人研究《马氏文通》，并不全面了解马建忠其人其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缺陷。蒋文野同志关心乡邦文献，留意搜集有关马建忠的资料多年，对所搜集到的丰富资料加以精心考证，写成《马建忠编年事辑》一书，然后马氏的生卒年月、乡里、家世、家境，他的生活道路、事业成就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何以撰写《马氏文通》，如何撰写《马氏文通》，始得为后人所知晓。

书中对《马氏文通》究竟为谁所作，也论之甚详。谁作《文通》，在30年代，就有多种说法。有人说，《马氏文通》是“马相伯与马眉叔（即建忠）共成之，而卷端未尝署名，盖先生欲奖成眉叔先生，不愿分其盛誉也。”（见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有人干脆说《马氏文通》为马相伯所作。当时说者自说，而闻

者也并未深究。待到1983年朱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上发表了《〈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认为《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这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文野同志在《事辑》中极为肯定地说,《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建忠。其理由有三:

一、马建忠在自己的文稿中多次论到语言规则和文法,早有编著《文通》的意图。

二、马建忠留学法国,精通英法文字以至希腊、拉丁文,熟悉四书、三传、诸子、语、策、史、汉、韩文,而本人又善于写作古文辞,具有撰写《马氏文通》的条件(马相伯亦精通多国文字,但古文献修养恐不如其弟,《许国璋论语言》中《马建忠及其语言哲学》一文附注13有此看法)。

三、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与马建忠比邻而居,马氏每成一条,梁氏即先睹为快,有时还与梁商榷。(见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就是说马建忠实际撰写《马氏文通》有重要的人证。

又当时马建忠的声名实不亚于乃兄,说马相伯不在书端署名,乃欲奖成其弟,可谓无据。

经文野同志周密的论证,《马氏文通》为马建忠所作,已成定论。

《马氏文通》体大思精,引用古文献例句很多,有七八千句,分析排比,至为繁细,非逐段逐句耐心地看着下去则所得很少。文野同志寝馈其中,历有年所,由所为文十余篇编成的《〈马氏文通〉论集》一书,很值得一读,其特点有三:

一、有自己的观点和创见。无论是对某一问题的“辨正”,还是对《文通》某一内容的“述评”,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有新意,能使读者有所得益,加深对《文通》的理解。例如《马氏文通顿、读简论》一

文,通过对《文通》中例句分析,揭示了“顿”“读”有作为“诵读单位”和“语法单位”两种功能,从语法角度看,“顿”“读”是《文通》语法系统中互补的同一级语法单位。特别是《论〈马氏文通〉与中国文化》一文,使人耳目一新。《马氏文通》的研究者往往从它是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开辟了我国语言学的新阶段这一个层次来评价它,认识它。而文野同志则将它放在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来认识它,指出《马氏文通》是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言实践相结合的范例,开辟了学习西方文化的路子,从而成功地构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新的评价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

二、多角度地研究《文通》,拓宽了《文通》研究的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多从语法的角度来研究它、论述它。而文野同志则认为马氏以“文通”命名其著作,其意义不限于语法,他的雄心壮志在使观其书者“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例言》)他认为其书之大用,“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将大群焉。”(《后序》)因而,马氏撰《文通》,内容不限于语法,还涉及词汇、修辞等各方面。文野同志基于这种认识,遂先后撰写了《〈马氏文通〉与词汇研究》、《马建忠对修辞学的贡献》等文,对马氏在词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分析,拓宽了《文通》研究的领域。

三、材料翔实,具有说服力。研究《马氏文通》要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就必须占有翔实材料,才会具有说服力。文野同志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材料的选择与考覈,就是《文通》用例,也要进行核查。对《马氏文通》的论点、论证也都要反复研究、揣摩、分析。文野同志《〈文通〉界说中一个标点的辨证》一文,就是在揣摩之中发

现了问题，而后写成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果说1988年《马建忠编年事辑》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语言学家马建忠研究的空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末，文野同志的《〈马氏文通〉论集》一书，则拓宽了《文通》研究的领域。我相信，文野同志通过不断的努力对马建忠和《马氏文通》的研究必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廖序东

1995年元旦

目 录

序.....	(1)
一、 维新先驱,语法泰斗.....	(1)
二、 关于《马氏文通》的史实辨证	(5)
三、 论《马氏文通》与中国文化.....	(11)
四、 《马氏文通》与词汇研究.....	(16)
五、 马建忠对修辞学的贡献.....	(28)
六、 《马氏文通·正名卷》简论.....	(34)
七、 《文通·界说》中一个标点的辨证.....	(40)
八、 对《马氏文通》词类标准的再认识.....	(42)
九、 《马氏文通·名字章》简论.....	(49)
十、 《马氏文通·动字卷》述评.....	(56)
十一、 《马氏文通》“顿”“读”简论.....	(62)
十二、 《马氏文通·句读卷》述评.....	(68)
十三、 《马氏文通》用例正误.....	(73)
附:马建忠编年事辑(增补稿).....	(77)
后 记.....	(191)

——维新先驱 语法泰斗

——纪念马建忠诞生 150 周年

今年是我国近代爱国思想家，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诞生 150 周年。

马建忠字眉叔，1845 年 2 月 9 日出生在丹徒城中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里。父亲马松岩，丹阳人，因在丹徒行医、经商而定居丹徒。长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粮台，次兄马建常，即马良、马相伯。马建忠幼年就读于天主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因“愤外患日深”，抛弃举业，“专究西学”。1876 年 8 月，曾以郎中身份去法国入巴黎政治学院攻读外交、法律，又兼习矿学。1880 年 3 月，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仅获赏二品衔候选道，“交军机处，总理衙门存记”，一直为李鸿章办洋务，曾多次出使外国，先后去印度协商增加鸦片入关税。1882 年 3 月，因他深谙外文、通商事宜，由李鸿章推荐偕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鲜，协助该国政府与美国订立通商条约。后来，英朝、德朝通商条约，也由他协助签订。同年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冲进王宫，杀害闵妃，围攻日本使馆，日人有死者。日本君臣以此为口议将大集兵舰，落朝查办。马建忠与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急赴朝鲜。乘日军尚未全部集结之时，马建忠一面诱拘握有兵权的大院君长子戴冕；一面麻痹、稳住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等。在大院君回拜时将其拘捕，押送天津。十天平定了朝鲜内乱，辅助朝鲜国王李熙复位，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后来，他受李鸿章委托，一度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以查勘、整顿。翌年时值中法战争紧张，法国侵略者以封锁吴淞要挟，马建忠会同局董唐廷枢、局雇英国公正律师担文，果断地把招商局轮船换

旗暂售给美国旗昌洋行,并定中法战事结束后收回。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马建忠按期收回招商局船产。后又任上海织布局总办。因与洋务派官僚盛宣怀意见不合,遭李鸿章斥责。他深感抱负不被理解,更无从实现。离开了李的幕府,寓居上海眉寿里,以著作自娱。

1900年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和帝国主义联系实行“自保”,李鸿章被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从广东来到上海,召见马建忠至行辕办理公务。他因译俄文密电而劳累过度,热病发作,医治无效,于是一颗彗星在黑暗的中国殒落了。

马建忠是我国近代改革的思想家。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因循守旧,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不断革新。“变而后能胜。”在他陈述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时指出:“士大夫中设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他应用近代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实经济,他首先提出富民是富国的中心和主要出发点,又是富国的基础和标准。“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强自治,措之裕如”。他主张支持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对于列强和封建势力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不满,提出公司要由商人自己办,在免除国内厘卡的同时,增加洋货进口税,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出:“每届各国修约之期,必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税则不亚欧洲各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他在我国最早主张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开矿。他在《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中提出“债者,所以剂盈虚,通有无,与市易之道并重”“泰西各国,无一非债欠数千兆,而英、法、德、俄之称雄如故也。”“今中国议开铁道,当以筹款为先。顾将筹之于官乎,而京协等饷,拮据已甚;

抑将筹之于民乎；而风气未辟，集股维艰。无已，则有借洋债之一法。”他分析说：“夫借债以开铁道，所谓挹彼注此，非若借债以偿赔款而贻偿息之累。”“铁道专由商办，而借债则官为具保，如是，则阳为借债之名，阴收借债之效。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何乐而不为呢？他还分析说：“借债与入股有别，入股可坐分每年赢余，借债者惟指望按年之利息。中国创行铁道，绵亘腹地，岂可令洋商入股，鼾睡卧榻之旁。”又指出：“夫通道为浚利之源，借债乃急标之举，术虽补苴，要皆气数转移之机，国家振兴之兆。苟于借债之中不筹一泛应曲当之良法，而顾颉颃焉虑肖流弊而中止也，是何异虑色荒而禁婚姻，虑禽荒而废搜狩也，弗思尔矣？”如此精辟的见解和分析，在一百多年前提出实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恳切的。他的思想成为后来维新派精神材料之一。

马建忠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撰写的《马氏文通》，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奠定了我国语法学体系。更为重要的，它是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与中国语言实际结合的范例，成功地构建了中西文化的桥梁，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范例，为近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马建忠是近代一位爱国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乡贤。虽然，他曾因建议修筑津通铁路和主张借外国汇丰银行款筑中干铁路为人弹劾，遭镇江籍寓京人士开除其镇江乡籍。他在1897年离开李鸿章幕后，以10万两银子为资本在丹徒城里开设元同钱庄以促进桑梓经济发展。委托邑人陶步蟾为经理（江苏商界巨擘陆小波和后来任江苏财政厅长的李耆卿即为该庄学徒）。后因经营不善，把银山门至镇屏街一带房产卖给法国天主教堂，以得银善后。

马建忠的一生可说是一个救国救民的爱国者探索的一生，但

二 关于《马氏文通》的史实辨证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发表了朱星先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提出《马氏文通》的作者应该是马相伯的意见^①,引起了议论。其实,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在三十年代就有不同看法,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今天,这种意见既然重新提了出来,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弄清这个悬案。

朱星先生说:“一般人只知《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所作,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外文秘书,不知道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接着,他扼要地介绍了马相伯的历史,言下之意,马建忠只是一个普通的外文秘书,写不出这样的著作,只有马相伯这样的教育家才能写出。

知人论世,这是我们评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同样,研究《马氏文通》,也应该联系作者的思想体系和经历。朱星先生从这点出发来考定《马氏文通》的作者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对于马建忠情况的介绍有很大出入,因而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马建忠的生平事迹。

马建忠 1845 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里。兄弟三人,老大马建勋因参赞李鸿章营幕戎机有功,曾任淮军粮台;马相伯为建忠次兄。建忠七岁随家迁徙上海,进徐汇公学学习拉丁文、英文、法文,成绩优异。1876 年清廷派闽厂学生赴法、德学习制造,马建忠以郎中身份为随员去法国学习交涉、律例等学。为了国家的富强,他发愤学习,先后参加法国政治学院律师、政治、出使等学位考试,都获得优异的成绩,受到学师的称

赞。光绪五年，马建忠参加文词科考试获选。光绪四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前，在总理衙门阅读郭嵩焘大使给李鸿章的信件及其他抄件时，当他看到马建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后，不仅仔细地阅读，而且全文抄录在日记上，并赞扬道：“闻建忠年方二十有六（按指上李伯相书时，引者），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畅，自达其意，洵英才也。”光绪六年，马建忠参加法国理科学位考试，获博士学位而归，授候补道员衔，入李鸿章幕中。光绪八年春、夏，曾多次被派往朝鲜，主持朝鲜与英、美、德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六月，朝鲜内乱，马建忠奉命带队妥善处理；此后，马建忠又曾会办招商局，督办上海机器纺织局。在这些活动中，他经常起草章程，议订条约，这使他深刻认识到语言的作用，促使他研究语言规律。1884年5月，他在给李鸿章的一份电报稿中就已提到“其文法须斟酌，一二日可到。”^②1894年的《拟设翻译书院》一文中，对于语言的运用更有深切体会和精当的议论。“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栴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③这里，“深嗜笃好，字栴句比”，“考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的研究方法，和《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先后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马建忠写《文通》是他知识，经历的必然结果，只是他一直“为事拘牵，志未得遂”^④。1894年，马建忠离开李鸿章幕府，重理旧业，著《马氏文通》。书成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历时四载。

梁启超是第一个评述《马氏文通》的人。还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马氏文通》还未完稿，梁启超就在《变法通议·论幼学》

一文中，透露了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的消息，并论述了它的意义。“余所见者，马眉叔（建忠）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余昔教学童，尝口授俚语，令彼以文言达之，其不达者则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日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几成文矣。学者甚易，而教者不劳。以视破承起讲，支支节节而使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次焉。”接着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马氏文通》：“最近则马眉叔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此后，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著作中，都对《马氏文通》备加推崇。而尤以1923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文中的论述最详：“《文通》十卷，丹徒马建忠眉叔著。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念孙）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 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梁启超的这些论述都肯定马建忠著《文通》，这是可信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因强学会被封禁，梁启超从北京来上海，与黄公度、汪穰卿等以强学会的余款筹《时务报》。这时，住在跑马厅，与马建忠住处爱士文路眉寿里相近。梁启超每晚就马建忠学习拉丁文，两人相谈甚洽。梁启超当年为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作序。“今秋上海忽获合并，共晨夕”，马建忠写《文通》，是梁启超亲见的事实。^⑤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文通》著书的时间的光绪二十一、二年。

当时,马氏兄弟不在一处,马建忠在上海,马相伯仍在北京李鸿章幕中供职。马相伯回到上海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事。马相伯说过:“中堂(指李鸿章)见嫉于翁师傅(指翁同和),遂从北洋大臣调任两广,我也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书呆子的生活。”^⑧这同《李鸿章年谱》:“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为商务大臣前往南方各埠考察商务。十二月命署理两广总督”的叙述是一致的。当马相伯回到上海时,梁启超已出走日本,梁、马当时没有见面。这也有证明。方豪纪念梁启超逝世十周年而撰写的,经马相伯过目的《马相伯与梁启超》一文中写道:“梁启超第一次会见马相伯先生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间,那时马老先生是为了中国留日学生发生学潮,他奉命到日本去抚平。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听到了马先生的演说,他把演说词记录下来……这篇演说词就变成了梁启超谒见马先生的引见贽礼。”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马建忠写《文通》时,马相伯不在上海。因此,梁启超看到的是马建忠写《文通》,而不是马相伯。

还须澄清的另一个问题,有人认为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仿马相伯《拉丁文通》而撰。“先生(指马相伯)著述,印成专书者,有《拉丁文通》,震旦大学讲义,现时绝版;其弟眉叔先生曾仿此书,撰《马氏文通》人皆推为中国第一部文法,颇享时誉。”[HT6SS]^⑨这更荒唐。《马氏文通》脱稿于1898年,而《拉丁文通》撰于1903年。马相伯自己说过:“吾幼时读外国书很困难。字典、文规都没有,法文文规是吾译的,《拉丁文通》还是吾为震旦编的讲义。”^⑩《拉丁文通》既是“震旦”所编讲义,那就应该在创办“震旦”的1903年以后,怎么可能前者会仿后者呢?关于《马氏文通》,三十年代,马相伯老人也曾多次谈及。

1932年5月凌其翰所录《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不求甚解与不厌甚解》中说:“讲到《马氏文通》是吾弟眉叔经二十年长期的记